

#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 自序

1998年，对于我来说，是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在15年的书斋生活之后，由于某种安排，或说是命运的安排，我突然由遥远的古典文学国度转向现实世界，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并随之走进了现实的中国文坛。

一年前，我所任教的中国新闻学院因为计划让我带研究生，派我到新闻媒体参加新闻实践。一开始安排到某通讯社的一个对外发稿中心。不到半日的新闻实践，我看到：几十个电脑屏幕上所显示的文稿，如同机器制造出来的似的，只有内容的不同，而无风格的差异。这一点以前作为读者虽然也有感觉，但感受并不深，现在当你要作为编辑来审视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想要改造其风格的强烈愿望。但要改动，就得大改，于是我提出去采写，有关领导答复我先要当一段时间的编辑再考虑。这样，我知难而退了。

《中华读书报》格调高雅，比较敢说话，信息量较大，是我近两年一直自费订阅的报纸之一。常在其中露面的王晓琪曾经在人大出版社做过我的一本书的责编。因为了解，又是单位派出，所以电话一说便妥了。读书报正好扩版，有个《时代文学》的专版正要人。我一开始觉得《文史天地》专版似乎更适合我，因为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则比较陌生。但我已经别无选择，我生性也喜欢接受新事物，这样，约个时间，见过主编梁钢建之后，就开始了采访当代作家的记者生涯。

记者真是一个好职业，他可以使你打开隔绝你与外面世界的门窗，使你走进这个现实世界，走进他人的世界。

这样说，并不是说当学者不好，坐冷板凳不好，但不是学者的记者，常常只能是一个“记录者”，只能是把别人说的、做的记录下来，而缺乏自己的研究与深刻思考；而纯粹的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个针尖上的问题，不可谓不专，但又失之于太专、太细、太局部，常常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所以，以我亲身的体验，主张职业上的“杂交”：学者走出书斋，当记者，当作家，你就会豁然开朗，呀！原来世界这么大，这么精彩，像是久居斗室的人，忽然放浪一游，在春天的草地上打个滚，翻个筋头；而当记者的、当作家的也去当学者，你也会有豁然开朗的感受，呀！原来今天的许多问题、现象，是历史的继续，是历史现象的重演，你会像是久游不归、浪迹天涯的游子，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中，坐在久违的书斋中，可以静静地阅读和思索。

学者、记者、作家，此三者可以说是我的人生理想。把书斋的、书本的、历史的，与实践的、现世的、想象的融为一体。

三者之间，确也存在着角色之间转换的问题。由学者去做记者，由被人采访到去采访别人，不仅有职业上的转换，也要有心理上的转换。每每在采访之中，我不由自主地想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这时，我就会提醒自己，现在，我是记者，而不是学者，应该多听对方说话。

新闻学院的学生，常常有人来请我介绍采访和写作的经验，也时常有人来讨要我在报刊发表的文章，这使我产生了将我的新闻作品结集出版的念头，因其绝大多数是与当代作家的访谈，故名之曰《与中国作家对话》。

学生们让我谈谈采访经验和体会，我常会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我就是那么自自然然地与作家们聊天，自自然然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作家们的真实想法也就那么自自然然地像是小溪的清泉一样涌动而出。看来，要说体会，首先是自然，自然地敞开你的心扉。也就是说，要想让对方敞开心扉，记者首先要肝胆相照，以诚待人。

自然了就会有对于真实的追求。一年前，我还是新闻专业的门外汉，我还能记得我第一次采访作家的紧张。但门外汉自有门外汉的好处，那就是束缚少，更易于创新，最为重要的是有勇气和自信确认自己的真实感受，面对媒体与大众已经成为惯例与公理的写作模式，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因此，我写专访，总是要问问自己，我的采访对象所给予我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张贤亮与张洁不同，王蒙、宗璞、王朔也都各不相同，要切实实地写出自己的真实的因而也是独特的感受。

基于真实，我的另一点体会就是个性。然而个性的基础恰恰是真实。具体到我的个性，除了上述诸方面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希冀以文学实现对于新闻的改造，或说是尝试新闻与文学的杂交。在新闻中，特别是有一定篇幅的文章中，譬如专访、话题文章等，融入文学的意蕴，这也是我的一点追求。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

是为自序。

1999年岁首于北京本斋寓所

## 编辑手记

近来，学者木斋以“王洪”的名字，在《中华读书报》陆续发表的对于作家的专访和话题文章，以其深厚的文学底蕴、真诚的情感、古典美的诗意境界、深邃的思想和尖锐的批判精神，引起了作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本社特将其编辑成书，以飨读者。

作为本书的编辑，可以说，我是怀着欣喜的心情一气读完的这本书的，大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我被书中特有的美感深深地吸引了。

用散文的笔法写新闻是此书最显著的特点。书中无论是对王蒙、张洁、张贤亮、贾平凹、刘震云、铁凝、王朔等作家的“新闻专访”“采访印象”；还是在“话题文章”“批评文学”中直面文坛现状——追综知青话题、呼唤科技文学、纵说儿童读物、批评诗坛现象、评议自由作家群体、漫谈作家稿酬收入、与作家调侃“世界杯”等等，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文学气息，甚至可以说洋溢着诗意气息，给人一种清风迎面的爽快，雨洗浮尘的宁静。

这种美感，与作者木斋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的身份不无相关。近年来，他出版的《唐宋词流变》《中国古代诗歌流变》《宋诗流变》《苏东坡研究》等学术专著，不仅以其学术价值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且其文笔的优美也受到了赞誉。正是由于他有着这样厚重的文化积淀，才使得他的作品中，精美的散文式手法、精心的人物刻画、精彩的诗词化用随处可见：

王蒙先生微笑着为记者打开了厅门、山脚下的海水，如同一幅靛蓝的图书封面，迎目悬挂在客厅明净的窗口。

……

山坡路边，翠柏如洗，回头看，王蒙先生夫妇还在门前向我挥手道别，背景处，如有海的涛音。一首诗作吟诵在心：“你，只有你/你，只是海/躲避你，抱怨你，唾吐你/一样的雍容自在/徘徊你，吟咏你，缠绕你/又怎能解得开你的风采。”这是王蒙的《海，还是海》。

在电脑蓝色的屏幕上整理采访记录，记者突然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屈原。“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可惜，他精心培育的“兰花惠草”，却追逐功名，贪婪求索，一片“众芳污秽”，这不能不说是屈原的悲剧。而今天，站在世纪之交时空的峰颠之上，我们不能不珍惜“重塑国魂”的历史契机：“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有时在坦诚的批评中，也采用精美的散文笔法写出：

此前，徐迟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则犹如早春的第一支花蕾，预报了弥漫芳香的气息。记得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撬动。”历史恰恰给了徐迟这样一个支点，使一位文学家对一位数学家的描述成为了撬动中国历史前进的杠杆。而今，20年的光阴驶过，人们仍然无法忘记徐迟和他的这篇美丽的文字。……徐迟之后，科技文学的花园里，是一派秋风的萧瑟，与日新月异的科技成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近乎小说的形象刻画，也给新闻文体的文章增色不少。在作者笔下，张贤亮的热情、毕淑敏的平易、铁凝的豪爽、梁晓声的“各色”都刻画

得惟妙惟肖，作家们一个个跃然纸上。譬如，写贾平凹的那种不善言词，那种只可心领，不可言传的感觉：

评论家称贾平凹的《高老庄》是一片氤氲混沌，难以概括、是难于抽象出某种界定的原生态。对于他的访谈也同样如是，这种感觉不仅原于他操着浓厚的商州乡音，而且他的回答方式也常常让你感觉如同面对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又如蓝田暖玉，可赏玩而难以置于眉睫之前。让你感觉大致是这么个意思，但又不能这样概括。比如在谈到研讨会评论家们的评价，笔者追问他觉得哪些评论捕捉到他的内心感受，他不紧不慢地说：有几个观点，咋说呢？马上你就开窍了。形而上，形而下，虚与实，实与虚，小说观念的改变，有人给我看易、道，一而二、二而三、反正我就知道以后该咋个搞法了。大家都笑了。

有时，作者将自己生活的细节与采访的内容溶为一体，使你觉得采访对象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如采访完二月河后，作者写道：

撂下电话，急急落座看雍正。大家说，得！曹雪芹家已经抄完了。遗憾！好在采访顺利，我可以安心度假去了，在这个二月季节里，凌冰解冻，正是一年春好处。

有时作者展示的不仅只是文坛现状、作家心态，而是以一位记者的敏锐、一位学者的责任，用精美的语言揭示着一种人生的哲理，一种深邃的内涵，如：

深夜中采访张洁，就像是幽怨秋风，星夜洞箫，青灯古寺，像是月光下波动的江水，充满着生命短暂的悲衰与人生的哲思；而上午时分采访张贤亮，则像是夏日里灼热的阳光，像是登泰山而一览众山之小。张洁老庄式的退避与张贤亮李太白式的政治豪情，恰成互补。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学者的严谨中透着洒脱，记者的坦言中充满真诚。我愿将此书推荐给读者朋友们，邀请他们一同去窥视当代文坛上我们所关注的作家们，一同去探讨当代文坛中的热点话题，同时也一同去体验那种难以言传的美感。

本书责任编辑  
1995.5

## 与中国作家对话

## 作家专访

### 大音希声 大悲无字 ——三八夤夜访张洁

三月八日晚，王晓琪来电话，商量三月的组稿。三月是个盛装的节日，别的不说，小平题词，两会召开，加上本日的妇女节就使每月一期的《时代文学》不堪重负了，所以，原先列下的一串长长的女作家的名单，就只能选一位代表了。两人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张洁，不仅是因为一部新时期女性文学史要从张洁讲起，而且似乎好久没有张洁的声音了——在她的母亲去世之后。“就是张洁的这个电话号码也是很久以前的了，你试试看吧！”

也许是由于不抱希望的缘故，我试拨了电话，没有顾忌此时已近午夜时分：

请问，这是张洁老师的家吗？  
我是张洁，您是哪位？

对不起，打扰您了，我是《中华读书报》的记者，不知您是否能接受我的采访。

我已经很长时间都远离文坛了，电视台来邀，我也逃之夭夭。不过，《读书报》我一直看，办得还不错。新闻媒体也有一些好朋友，但都事先有约，互相不作节目。没有什么功利反而是好朋友。

非常想作您的朋友。那么，您正在写些什么？  
《无字》。

是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意思吗？  
是大悲无声，大悲无字。

这部书是写什么的？  
就是写“无字”。

像是庄子所说的“得意而忘言”，但总还要先通过语言，否则，就没有小说了，先要“言者所以在意”。所以，能简要地介绍一下吗？譬如主要的情节、人物等等。

真的不会作这种概括，也没法概括，时间跨度很大，要从世纪初说起，中心人物也有很多，有农民离开土地，有知识分子，规模很大，至少得写三四部，一百多万字。你还是自己去看吧。作家就是应该让作品去说话。现在《小说界》（上海文艺版）开始连载第一部。

这部长篇花费了您很多的心血吧？

立意是很久以前就有了，母亲去世使我不能写作，但也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心很安静，写了很久，之后来回改了两三年的时间。写得非常累，每天早晨起来就写，遛遛就算是休息了，写完了第一部也很长时间不愿意去发表，终极的目的好象不是发表，乐趣就在“改”之中。别人走红我也不着急。书中的人物这么多年了，陪伴着我，我都不知道一旦写完了，就等于和这些人告别了，每天怎么过？

您好像还没有从母亲去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是的，大概永远无法摆脱了，这也是人类永恒的悲哀。我也知道这样的心态不好，但没有办法。

对于您个人的身心当然不好，但对于作品，可能会更为深刻，这是那些浮躁的人难以梦到的一种深沉境界。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大多是这种对于人生深层思索的果实。

也许是这样，但写作对于我来说，不过是生活本身。

放下电话，已是暮色深重，我的心境也沉重如磐，像是一副“沉重的翅膀”，难以飞动。是夜，我辗转难眠，决定以后约个时间去拜访张洁。

### 以赤子之心观照现实社会 ——张贤亮专访

张贤亮的作品，从《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到近作《小说中国》，一直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剖析社会人生。尤其是他的《小说中国》，以作家的身份，纵谈天下大事，以文学性的政论随笔的形式，大胆涉足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域，其中不乏惊人之论。3月13日上午10时，记者在京丰宾馆采访来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贤亮。这位西北作家一身得体的西装，风度翩翩，当年痛苦的风霜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消融。

请谈谈参加两会的感受。

这次两会，是十五大之后召开的，对于继续深化改革有明确的目标，很成功。我的《小说中国》在两会以前已经发行了10万册，影响很大。不过当时出版社的编辑认为，此书根本不能发表，但江泽民十五大报告之后，知道可以出版了。因为，我的观点与十五大精神有三条一致：一是高举了邓小平的旗帜；二是多种体制的经济形式；三是肯定了私有制。这样，这部书才得以出版。当然，会有许多争议。我认为此书对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有很大的作用，因为我是从文学家、作家的角度，与学者不同。

昨天，共同社记者访问我，说：现在大批工人下岗，是否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我说：中国有六千万打工妹，这些工作城市人为什么不能做？要改变观念，要改变认为是“降格”的观念。多年的大锅饭，已经削弱了他们的竞争能力。还有民主进程的问题。从法律上看，中国是非常民主的国家，在法律形式上已经很完备，为什



么会有法不依，很大程度上是民众缺乏法律意识，以至于无法无天。过去，一个生产队长就是土皇帝，承包责任制后，生产关系转为拥有自主权，人们也就可以“秋菊打官司”了，这是根本性的变化。我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二十多年，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绝对是好的方法论，只要真正掌握，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譬如怎样体现公有制之下的私有制，社会主义就是在劳动共同体基础之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一方面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一方面，股份制又给这种个人所有制提供了可能性。

请您再谈谈个人的创作近况。

现在，还有两部书稿在电脑中。超越别人容易，超越自己难。我不想重复自己的手法，所以，每部小说都不同。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绿化树》不同，《我的菩提树》与《习惯死亡》又不同，我不想在平面延伸。

我还是喜欢您早期的作品。作家们似乎在为了求新而求新，反而迷失了自身的价值。

但我不是。我是把积蓄了 20 年的经验凝结在 20 万字里。感受决定形式，不用这种新的形式无法表达。主要是使用蒙太奇的手法，所以，人称、形式等都乱了。您的公司经营情况怎么样？

很好。就是我们自治区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西部影城”。

下海对于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很重要。为什么要下海经商？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是作家不能脱离社会。我之所以写劳改生活写得好，是由于它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是用所谓“体验生活”“体验”不来的。现在我经商也是这样，赔了才会真心疼。

所以，王蒙先生曾对作家的“职业化”提出异议，作家看来是不能从社会中游离出来。对了，两部书稿的名字叫什么？

《百年一人》和《钱歌》。

约半个小时的采访，张贤亮给我留下热心政治的印象。当然，张贤亮还是文学家，是以文学家的赤子之心观照现实社会。他的坦荡豪爽的言谈举止，他的口无忌言，放言纵论，正表明他文学家的本性。

### 一个逝去时代的灵歌吟唱 ——尘埃落定访阿来

第一次耳闻《尘埃落定》，是两个月前采访知青文学时。当时颇感惊讶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藏族青年的作品，何以使《人民文学》这一权威出版社的几位老总交口称赞，如高贤均副总编不无玩笑地引述评论界的说法：“什么是茅盾文学奖，这就是。”以后，这部描写一个傻乎乎的“阿甘”式的土司儿子的命运遭际的作品问世之后，即刻就引来

了如潮的好评，认为此书传达了“经典来临的消息”，其艺术成就“丝毫不让《古船》《白鹿原》当年。”在细细地阅读了这部作品之后，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阿来。

据此书的责编之一脚印女士介绍，阿来生长在四川阿坝地区的一个土司之家，有着深厚的藏族文化底蕴，恢复高考以后，在一所水利专业的中专学习，现在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任编辑。《尘》书之前，发表过诗歌和小说。

4月15日，记者与阿来通上了电话。他的普通话很好，声音浑厚、谈吐质朴自然，他说正要陪中央电视台到他生活过的地方去拍外景，很忙。记录了我的采访提纲，翌日就发来了笔谈的电传。电传稿是电脑打字，下面用钢笔手写了几行附言，书法颇有功力，粗犷豪放。对于“出身土司”之事，他否认：“在血统上，我和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家族没有任何渊源。而我生活的时代正是从小说中止的地方开始。在我们生长的时代，什么样的出身已经很不重要。”

对于自己的经历，他进行了小说式的描述：

我出生于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小村子的名字在我的一些小说里出现过：卡尔古，是山沟更深处意思。你可以想象她有多么僻静遥远。但这种僻远却不能逃避这个时代所必须经历过的一切。我在村里只有两名教师的小学里上小学时，就经历过所谓的复课闹革命，也为走“五七”道路经常参加劳动。童年时代的记忆中最多的那个时代的饥饿与匮乏，那种无奈中的木然与悲哀。十三岁，我离开家，到几十公里外乡村中学上学。那个时代的新潮人物中，我比较喜欢黄帅，但不喜欢张铁生。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成绩好而又不驯服的学生。

然而，尘归尘，土归土，我又回到乡村。乡村里，旧有的道德与规范早已崩溃，新的规范与道德形成却又遥不可及。生活贫困、纷扰，而又庸常。在这种情况下，较之于展望未来，回忆过去往往更容易，更富于诗情画意。于是，一个逝去的时代带着残酷的英雄气，带着血腥的浪漫情在传说中越来越栩栩如生。这种情境，只有送葬队伍吟唱灵歌时的气氛可以比拟。我在一首诗中曾描绘过这种情境：

送葬的人们越走越高  
把谷底的村子抛在身后，并且歌唱  
男人在歌唱  
女人在歌唱  
老人在歌唱  
少年在歌唱  
像是要远离众多的日子与艰难的村庄  
他们歌唱着仿佛要去到天上  
而我好像有些事不关己，总在一边默默观察：  
留下我，目送他们  
并且照看栏中的牛  
园中的苹果，核桃及药草

地窖中的盐、茶叶与针线就像《尘埃落定》有一定的象征，这首诗里也有象征。这里的我已经有些像写出这部小说的我了。我这样描写众生：‘送葬的人们，排列成行/表情阴柔，像一群智慧而困惑的/宿命论者，像团团灌木阴凉了无思想。’这是一种诗化但过于悲哀的表达，而在我的小说里，已经突破了这种看法。

在谈到他的创作道路时，他说：

到二十多岁，我开始接触到文学，并清楚感觉到这种东西给我的震撼。第一次读到普希金，读到海明威的那种难以言状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我真正当成小说来读的是海明威的一个短篇，叫《印地安营地》，之后是菲茨杰拉德，是惠特曼，是聂鲁达，是叶赛宁，这个单子越来越长。最终的结果是，我也拿起了笔，做我自己想作的表达。

对作品的自我评价，阿来有着相当的自信：

小说写到三分之一，我心中就有种一部好作品正在诞生的强烈预感。当故事的轮廓逐渐清晰，灵敏语感变成了一股潜流，整部作品有了一个稳定而富于节奏的调子。小说和音乐一样，有的调子呈现很多东西，同时还潜藏着另一些东西，而有些调子却空空洞洞，一堆零乱的符号而已。

对于《尘埃落定》的反响，阿来毫不掩饰他的“得意”。

### 雕塑当代中学生艺术群像

#### ——秦文君访谈录

提起儿童文学作家，几位朋友异口同声，都说当属秦文君时下最火。“六一”前夕，记者对这位“最受小读者的欢迎”的女作家进行了电话采访。秦文君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也带有江南的吴侬软语。秦文君原是老三届知青，在黑龙江的塔河教了五年书。这段生活经历，成为她走向儿童文学创作生涯的一个起点，或说是为她以后的儿童文学创作，铺垫了丰厚的生活底蕴。记者首先请她对于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回顾。她说：

1979年知青大返城，我回到上海，分到供电局做财务工作，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一所学校，我时常久久地逗留在学校的栅栏前，凝望着孩子们的升旗仪式，回想着自己教书的往事。就这样，我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一开始，主要是个人教书经验。自1981年开始创作，到写作《男生贾里》之前，我已出版了近20本书。早期以写少女小说为主，风格凝重，情感温婉，多少有点唯美的倾向。写作《男生贾里》，我一改“戏路”，追求一种明朗诙谐地表叙人物心灵的途径。作品出版后，来信来电不断。小读者都说：“贾里就是我。”要求写续篇的呼声也十分强烈。《女生贾梅》之后，小读者更是穷追不舍。续写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是向自己的挑战，因为续篇的艺术天地相对狭小，创造力易受束缚。因此，在1993年出

版了“贾里”、“贾梅”后，我一直按兵不动。其间，下学校，找资料，直至1997年初，心中再次燃起激情，一鼓作气写下了《男生贾里新传》《女生贾梅新传》和《小鬼鲁智胜》。可以说，酝酿的时间长而写作时间短。

那么，你怎样评价自己的作品的独特之处？

以幽默风趣的对话叙写当代中学生的日常生活，追求当代少年的心灵现实，并以他们的成长作为幽默的源泉。它在中国大型少儿小说的幽默品格方面具有开创性。

你对于我国文学创作的现状，有哪些忧虑呢？

首先，当前有些儿童文学创作正在依附成人文学创作，失却了儿童文学鲜明的特征。儿童文学脱离儿童的倾向会导致儿童文学的萧条。儿童是儿童文学的根本，忘了根本，任何探索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其次，儿童文学的法宝正在某些作品中淡化，内容较为贫乏，片面追求形式，只有深刻厚重的内容，而缺乏神奇的想象力以及独特的少儿灵气和浪漫色彩，因而得不到少儿的心灵认同。

请谈谈你今后的创作计划，在艺术风格上有何新的尝试。

我的写作计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续写《男生贾里》。在写作《小鬼鲁智胜》的过程中，脑海中的人物一个一个地活跃起来，生动万千：林晓梅、张潇洒等，我如获至宝。决定写一部类似于“当代中学生艺术群像”的大型系列作品。它由《男生贾里》开始，把这群孩子从初一一直写到毕业。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大约会是十本。我的下一部作品会是《小丫林晓梅》。在这部作品中，贾里、贾梅、鲁智胜等这些可爱的形象会继续出现。将来，这些性格鲜明，人物各不相同的群像，使每个小读者都能从中发现自己。

在艺术手法方面，既承接原有的风趣的轻喜剧风格，又在每本书中尝试新的探索。比如《小鬼鲁智胜》是少年的心理历程，以故事快速推进，而《小丫林晓梅》则侧重于理想色彩，具备情感幻想的特征。总之，在这部大型作品中希望每本书既有相互的亲合力，又各具特色。

另一个层次，更值得一提。我是有计划地写几本给小学生读的作品，比如，已出版的《调皮的日子》，即将出版的《龙儿和大个子叔叔》等，这一类作品，同样是幽默的风格，但更强调童心童趣，将有一种可流传性的儿童本位、儿童精神推向极致。真正扭转儿童认为儿童文学不好看的错觉。让他们读文学乐此不疲。

白冰说你与学生始终有密切的接触，是吗？

八十年代以来，我一直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工作，现在是《儿童文学选刊》的主编。差不多每天都接到20到30封小读者的来信，这是我随时了解孩子们当前心理状态的一个桥梁。我认为，写作并不是记录生活，重要的是深入地理解描写对象的心理历程和审美方式。

## 在彷徨寂寞中前行 ——与刘恒一夕谈

第一次与刘恒通电话，是请他聊聊世界杯，刘恒抱歉地说，一定是搞错了，他并不是球迷。但他话语谦和，出语平易，恰似他的“新写实”小说的风格，使你很容易走进他的世界。不过，这次采访他却不容易，先是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位女士接了，说给刘恒找了个地儿写作去了，在城乡结合部，没有电话，要到二十几号才能回来。21日上午，记者试着拨了电话，刘恒居然在，说是昨天刮风，家里的窗子刮坏了，回来修窗子。看来还多亏刮风，否则，就只能另访他人了。

当晚，我们做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长谈。

开始的话题，围绕着刘恒创作道路的回顾。他说他的创作道路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他是1976年开始坐下来想写小说，所以，当全国恢复高考的时候，他却一门心思地写小说，并且处女作发表，这使他在新时期的初期，就跻身文坛，成为文学编辑，但也使他失去读大学的历史机遇，这是他终生的遗憾。1977年到1985年，是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作品数量少，积极性不高，主要精力投入到编辑工作了；1985年到1989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如《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个时期，在人生选择上，决意以写作小说为立身之本，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当时正是30岁，三十而立，突然有一种失落感，要珍惜生命，抖擞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创作；1989年至今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彷徨感。

“当你自以为文学很重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望感。”他说得有些沉重。

“而当有这种失望感、彷徨感的时候，就往往意味着要产生好的作品，意味着审美标准的提高和对于更深层面的追求。”记者按照自己的文学观念回答说。

“这也难说。要有自然淘汰机制。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作家作品，都是无数次淘汰之后的结果。现在仍是马拉松，谁和什么能剩下来还不好说。”

评论界称你的作品属于“新写实派”，你怎么看？

指责我的不多，这就比较寂寞了，是不是因为我在边缘。其实，只有真正抓住了我的弊端的批评，才能抓住我。泛泛的话听多了就麻木了。

我很同意，时代需要真正的文学批评。那么，你自己认为你们的“新写实派”有什么弊端？

其实，所谓“新写实派”是把不同种类风格的作家们装在了一个筐子里。就我自己的情况来看，我是沿着惯性写作，是一个自生自长的小苗，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是一种自然的生成，是下意识地选择对于人生的看法，然后，就变成了作品。它是反映什么的，

见仁见智，我也不知道。当然，自己也在阅读，但总的来说，还是下意识的标准在指引自己。苏轼的诗词，你什么时候去看，都有一种东西在涌动，我就是下意识地追求这种东西。

那么，你怎样努力实现这种追求呢？

有意识地把西方的作品系统地看看，把周围的作家作品定定坐标，起作用的仍然是手中的技术。我的观念已无可改变，但技术可以改善。基本的技术是语言技巧，技术给你的想象力以翅膀，使你的思想得以高飞。南美有位作家说，作家的基本文字训练应该在20岁之前完成，从我自己的过程来看，我15岁左右开始记日记，当时流行《雷锋日记》，一个小孩儿写日记，就逼着你的眼睛观察，也逼着你练习表达，同时，也是对于心灵的触摸，现在一直受用。以后，我有一段时间喜欢看字典，看每个词条所举的几个例子，那种渴求的愿望现在没有了，我对此感到恐惧。作家走下坡路，是从丧失对于语言的感觉能力开始的。不停地写作，这是惟一的方法。信息不能封闭，对好书应该特别敏感，从善如流，保持敏锐。

那么，你目前正在写作或是构思的作品是什么？

近一两年，我随时都处于构思作品之中。我的构思本子里已经有了几十个题目，有长短篇小说，有话剧，也有诗歌，有的已有较为详细的提纲，够我写下半辈子的了。目前我在搞剧本，不过，这个事情我不太愿意说。

以前，我们曾经有过曹雪芹、有过鲁迅，哪怕是沈从文，时代似乎在渴望着这样的文学巨匠。你怎样看？

一切是命运安排的，命运会安排的。

你自己有何雄心壮志？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不满意，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器，但我将尽自己的努力，使它达到最好的状态。

刘恒的谦虚，使记者产生了一种忧虑，感觉目前他似乎正处于一种创作的危机状态，一种“雪涌蓝关马不前”的蓄势状态。又通了两次电话，才知道他的几部书稿被几家出版社争夺，由于担心开罪于出版社的朋友，因此，不太愿意披露。其中有一部长篇，名为《秋虫》，约有30万字；有两部介于中篇与长篇的作品，其中的《旅行家》写一个象征性的故事，背景放在古代汉人统治的时代，主人公是个知识分子，另一部名为《抗战地理》，是研究抗战时期的地理，当然是家乡的地理。他的外祖父当过伪村长，又是地下党员，文革时也遭了一些罪，他回家时意外地听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成为此书的基本素材。

在风格上是否有什么变化？

追求创新其实很难，但与自己不同还是可以做到的。不断地超越自我，这是一个基本的努力方向。

你的写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还是比较苦的，写作时吃饭睡觉都不正规，一天也就一两千字吧，有时也枯坐竟日。

记者在做了这次补充采访之后，悬着的心也一下子放了下来。刘恒，虽然处于彷徨的时期，但他毕竟在彷徨与寂寞中前行了。

## 海，还是海 ——北戴河海滨访王蒙

1998年8月19日下午2时30分，北戴河海滨东山宾馆15号院。

王蒙先生微笑着为记者打开了厅门，山脚下的海水，如同一幅靛蓝的图书封面，迎目悬挂在客厅明净的窗口。

“4点还有一个约会。”落座时他不无歉意地说。  
于是采访立即开始。

今年从媒体得知先生时而出国，时而上山，现在又——“下海”（两人同说，笑），行踪难定，请先谈谈您今年以来的行踪好吗？

元月应美国康涅狄克州三一学院邀请，作为 Presidential Fellow（校长级住校学者），讲学一个学期。期间做过6次公开演讲，此外在休斯敦莱斯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伊阿华大学、匹兹堡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州大学和华美协进会社（当年胡适创立的）也做了演讲。其他时间照旧写作、读书，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今年5月中旬，回京以后投入写作，7月下旬来到北戴河，每天上午写作。能在海边写小说，惬意。8月初应吉林人民出版社之邀，到长春、吉林、长白山走了一趟。现在最让我每日挂心的是抗洪，你来时我也正在收看抗洪消息。

明天就要返京，所以这里弹尽粮绝，只能招待你喝白开水（笑）。8月27日至9月中旬，对北欧访问，这是应挪威外交部之邀。然后也许可以安心写作，呵，不行，9月底泉州有个华文作家会议，10月初，在河南博爱县有个李商隐会，我都得去参加，以后，我希望能在京过上稳定生活，安心写作。

您对出国访问有何感受？

幸运。我现在已先后访问过32个国家和地区，能把世界作为中国的参照系，能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成绩、力量，也有不足。能“风物长宜放眼量”，能有个时间、空间的坐标，不能只看一时，一地，要看到整个世界。

1993年以来，我4次访美，深觉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就正在逐渐改变世界的舆论，消除偏见，在比较上也能看到差距。多到世界走一走，对于我的写作、观念、表达思想都很有益，使我能看得更远一点儿、更客观一点、更冷静一点儿、更宏观一点儿。

从时间上来说，对于写作虽有损失，但收获更大？

用句俗话说，不赔反赚。因为我是全天候、抗干扰的，当然可以在家写，但也可以在旅途中写，在创作之家写，在烟台、深圳、珠海、香港、德、美、意都可以写作，只要能坐下来，就可以忘掉一切。在国内家中时，反而有各种会、电话、接待采访，最多时一天接待几十个人。

您在国外演讲的主要题目是什么？

有“传统文化新的机遇”“贾宝玉的自我认同危机”“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等，主要围绕国内文坛的近况、思潮、争论、事件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歧异等。

反响一定很热烈吧？

听众的气氛还是热烈的，在休斯敦的一个礼堂挤满了 400 多听众，这是不多见的。提问更关注于国内的改革开放以及作家的情况。他们比较欣赏我的直言不讳、不回避与听众交锋的风格，欣赏我的幽默和宽容。

我读到您的一些批评文章或言论，感到一种“有容乃大”的胸襟，从王朔到“泰坦尼克”，似乎总是从好的一面加以理解。包括“性”写得较多的作品，也不简单地看成是扫黄对象。

我本人不大写“性”，从小受家庭教育，对“性”是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的。

《金瓶梅》我在 63 岁之前读不下去，主要是心理障碍大，我不写“性”，但别人写了，我还是要从正面理解。

是否可以这样说，应跳脱出当下时空，登高远眺，对于各种文学现象给予应有的文学史长河的坐标。

对，特别是与自己相反的观点、手法，要思考其合理性。我喜欢“瞎子摸象”的故事，无非是摸到了象腿，能摸到鼻子就不得了了。

请再谈谈您个人的创作情况，特别是长篇的。

主要是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1993 年已出版，《失恋的季节》1995 年出版，《踌躇的季节》是 1997 年问世的。现在正在写的是第四部。

这个系列，我几乎用编年史的方式，以时间为经，人物内心活动为纬，希望写出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前三部分写的是 50 年代初期、1957 年反右和 60 年代的政策调整时期。

有人批评说，三部长篇并未引起强烈的轰动，认为我应该写得更好。我不指望特别轰动，对历史我是见证人。我与书斋型作家不同，从少年卷入政治生活，我一直在“风口浪尖”，对历史有责任，



应该把自己的见闻、感受、思索写下来。

我不想谴责什么、批评什么、鞭挞什么，不想辩护什么、颂扬什么，需要面对的是历史、是真实、是过程。历史的过程总是有其合理性的，称颂与鞭挞都不能改变它。

价值判断交给读者，我们只能真实表现过程，其中自有向往、批判、嘲笑。

对这一长篇系列的风格您本人怎样概括？

尖锐而不激烈。历史过程中有什么失误、惭愧，我不掩饰，当年的豪情、牺牲也不能抹杀。不对人生、社会一笔抹杀，也不一味高调，要成为一种真实的记录、见证。

这三部反响尽管不特别热烈，但平均印数在两万册之上，《失》被新闻出版署评为优秀长篇，使我更增加了信心。

您目前正在创作之中的第四部进展如何？

第四部写“文革”时期，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今年写到1/4或1/3，希望明年能完成。比起过去，写作速度是5年前的1/2，今后会更少些，也得服老。“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笑）让青年人多写一些。

中国文坛一直呼唤《红楼梦》式的作品问世，并对先生寄予厚望，您怎么看？

优秀的作品是不能重复的。好作品会出现的，很可能不是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今后，伟大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我也说不上，但这样提有好处，可以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否则，总是急于发表、出版，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作品。

不觉只有5分钟采访时间了，记者赶紧打住话头，匆匆合影留念。惭愧，只给王先生留下两分钟时间喘口气，4点时，他将微笑着不顾疲惫地接待另一位来访者。

山坡路边，翠柏如洗，回头看，王蒙先生夫妇还在门前向我挥手道别。背景处，如有海的涛音。一首诗作吟诵在心：

你，只有你  
你，只是海  
躲避你，抱怨你，唾吐你  
一样地雍容自在  
徘徊你，吟咏你，缠绕你  
又怎能解（Xiè，去声）得开你的风采

这是王蒙的《海，还是海》。

我与读者之间有一座灵魂的桥  
——宗璞专访记